

从“活着”到“活好”：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老年协会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惠安县H内村的田野调查

庄云霞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要

本文基于福建省惠安县H村的田野调查,以H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深入剖析该组织的运行机制、收入来源与功能发挥。研究发现,H村老年协会依托传统渔业共同体的内部纽带与情感资源,形成了共同体维系型运行模式,在老年人精神慰藉、日常互助、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负责人年龄老化、收入来源单一、造血功能不足、服务形式单一等问题。文章引入社会工作专业视角,从资产建设、增能理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优势视角、社区工作方法等维度,提出促进农村老年协会从被动维持向主动发展转型的介入路径与对策建议,以期为同类地区的老年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村老年协会, 社会工作, 资产建设, 增能理论, 老龄化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s from a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A Field Study of H Village, Hui'an County

Yunxia Zhu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H Village, Hui'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of H Village as a case to deeply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s operational mechanism, income sources, and functional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H Village Elderly Association has developed a community-maintenance operational model by leveraging the internal bonds and emotional resources of the traditional fishing community. It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viding spiritual comfort, daily mutual assistanc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aging of its leadership, single-source income, insufficient self-sustaining capacity, and monotonous service formats. Drawing upon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proposes intervention pathway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s from passive maintenance to active development, utilizing dimensions including asset building, empowerment theory, social support network construction, strengths perspective, and community work method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organizations in similar regions.

Keywords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Social Work, Asset Building, Empowerment Theory, Ag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并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特征[1],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导致普遍的农村空巢化现象,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农村老龄化挑战,不仅关乎亿万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福祉,更是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议题。

农村老年协会作为乡村内生性组织,是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也是激活乡村内生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传承优秀乡土文化的关键节点[2]。学界围绕老年协会的功能定位、运行模式与发展困境展开了丰富研究,普遍认为老年协会不仅增进了老年人福利,还促进了村庄社会整合与公共秩序再生产,为乡村振兴奠定了组织基础[3]。组织合法性与经济独立性、社会公益与互益、持续行动力来源被认为是乡村社会组织培育的三个基本条件[4]。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通过老协”的养老服务自组织路径,强调承认老年人主体性、嵌入村庄的资源动员和需要匹配、充分赋予自组织自主性是农村养老发展的核心要义[5]。

本研究聚焦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H村。该地以其独特的惠安女民俗文化、相对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以及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构成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场域。H村保留了传统渔村的原真面貌。渔业依然是村民的生命线,渔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和协作性,塑造了H村村民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互助精神。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H村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老年协会是如何建立并运行的?它在组织架构、资源动员、活动开展及功能发挥等方面呈现出何种特征?其运行成效如

何，又面临哪些深层次的困境与挑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期望能揭示沿海特色文化地区农村老年组织的运行逻辑，并为其他类似地区的实践提供镜鉴。

2. 研究方法

(一) 田野调查时间与周期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于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 月期间开展，累计驻点调研 28 天，其中集中驻点观察 18 天，分阶段回访 10 天，覆盖工作日、周末及妈祖诞辰等民俗节庆时段，确保全面捕捉老年协会的正常运行状态与特殊场景下的活动特征。

(二) 调查工具与资料收集

1) 调查工具设计

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调查三种方式。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协会组织架构、经费来源、活动内容、功能发挥、困境挑战与发展诉求等核心维度设计。针对不同访谈对象，提问侧重点有所调整，对协会负责人侧重组织管理与资源动员，对普通会员则关注服务体验与实际需求。

参与式观察按“日常活动”“节庆活动”与“互助行为”三类进行记录。日常活动主要观察老年人聚集时段的互动模式与话题内容，节庆活动重点关注重阳节、春节等节点的组织流程与参与氛围，互助行为则留意会员之间的日常照料、情感支持与矛盾调解等非正式互动。每次观察均记录活动时间、参与人数、互动过程、关键对话片段及现场场景特征。

需求与满意度调查问卷共设 25 个题项，涵盖服务内容、组织管理、资源获取与期望诉求等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计分。问卷发放对象为协会会员，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按会员年龄、性别及参与频率进行分层。

2)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田野调查于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1 月期间开展，前后共历时 3 个月。调查周期内，研究者累计驻村 28 天，分三次进入田野，每次持续一周至十天不等，以保证对协会日常运作、节庆活动及季节性互助行为的充分观察。

访谈对象的选取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兼顾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及不同参与程度的会员。最终完成访谈 18 人，其中包括协会负责人(会长、副会长、会计)2 人、协会核心骨干 4 人、普通会员 8 人、村两委干部 1 人、乡贤代表 1 人和独居/失能老人家属 2 人(见表 1)。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 份。文献收集主要包括协会 2023 年至 2025 年的活动台账、会费收缴登记、村两委相关工作报告、乡贤捐赠记录，以及地方志、民政部门下发的政策文件等，作为背景资料为研究提供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支撑。

资料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具体步骤为：首先对访谈录音逐字转录，与观察记录、文献资料一并导入 NVivo 软件；随后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初始概念；再通过主轴编码将相近概念归类，形成初步主题；最后结合田野笔记与文献对话，对主题进行整合与提炼，形成最终的分析框架。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始终保持对主题之间内在关联的敏感，同时注意不同资料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以保证分析结论能够扎根于田野材料。

(三) 访谈对象选取与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确保覆盖不同年龄、性别、身份的群体，共完成 28 人次深度访谈，具体情况如下：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表 1.** 访谈对象构成与特征

访谈对象类型	受访人数	访谈人次	年龄范围	核心特征
协会负责人(会长、副会长、会计)	2 人	4 次	68~75 岁	均为退休人员, 任职年限 5~12 年, 熟悉协会运作全流程, 具有较高社区威望
协会核心骨干	4 人	6 次	62~70 岁	长期参与协会活动组织, 涉及文艺表演、矛盾调解、互助服务等核心工作
普通会员	8 人	10 次	60~88 岁	含低龄健康老人、高龄独居老人、半失能老人, 覆盖不同服务需求与参与频率群体
村两委干部	1 人	3 次	45~58 岁	了解协会与村级组织的互动关系及政策支持情况
乡贤代表	1 人	3 次	55~65 岁	有持续捐赠行为, 熟悉村庄资源状况与外出务工群体特征
独居/失能老人家属	2 人	2 次	40~52 岁	长期委托协会照料家人, 能反映特殊老年群体的服务需求

3. H 村老年协会的组织画像

H 村老年协会成立于 1998 年, 历史较为悠久, 呈现出鲜明的内生性与互助性特征。协会最初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由几位老渔民和老村干部自发组织而成。在组织架构上, 协会采取相对简单灵活的形式, 由小学退休校长担任会长, 副会长 2 名, 辅以会计和出纳各 1 名, 理事会成员若干, 女性偏多。协会负责人多依自然威望产生而非严格选举, 管理上更依赖口头约定与传统惯例, 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会员发展方面, 协会覆盖了全村约 70% 的老年人, 会员总数达 685 人左右, 男性比例显著较高。会费设定为每年 30 元, 但收缴较为灵活, 对困难家庭常予减免, 体现了浓厚的互助精神。与一些追求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社团相比, H 村老年协会更近似一个传统共同体, 其组织架构相对松散却凝聚力强, 深深植根于渔业社区的互助传统, 展现出独特的社区韧性。在资源动员方面, H 村老年协会的运作经费高度依赖村委会的资助, 这构成了协会开展活动的核心资金来源。村委会每年拨付一定经费支持协会运转, 体现了村级组织对老年工作的重视。在社会捐赠方面, 本村乡贤构成了主要捐赠群体, 其捐赠行为带有鲜明的乡土情感与道义回馈特征, 年均捐赠额度约 2 万元, 主要用于重阳节期间对村内老人的集体慰问活动, 具体表现为发放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物资及现金红包。在自我创收方面, 协会曾尝试通过淡水鱼养殖项目拓宽收入来源, 但因养殖规模有限、市场波动及工序繁重等因素制约, 该项目年均利润仅维持在三四千元区间, 对整体经费的补充作用有限。活动场所方面, 协会拥有一处内部设施较为简易的空间, 以桌椅、茶具等基础配置为主, 实质上发挥着传统老人茶话室的功能; 得益于其便利的地理位置, 该场所已成为老年人日常聚集与情感交流的重要空间。整体而言, 这种以外外部输血为主、内部造血不足的资源结构, 既体现了渔业社区的传统互助特性, 也凸显了组织对集体经济和外源性支持的深度依赖。

在活动内容方面, H 村老年协会始终围绕内部维系与生活支持两大核心展开, 呈现出鲜明的内向型特征。在日常活动中, 协会活动室作为老人们的“社区客厅”, “话仙”(聊天)成为信息交换与情感支持的重要载体, 话题涵盖渔业生产、家庭生活和健康关怀, 构筑起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在节庆与信仰层面, 协会不仅组织重阳聚餐、春节团拜等传统活动, 更深度介入妈祖诞辰等民俗仪式, 通过组织朝拜巡游活

动，为长期面对海洋风险的渔民家庭提供重要的精神依托。从“礼俗社会”视角来看，老年协会在维系传统社会纽带、守护社区凝聚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6]。在互助实践中，协会建立了探访病弱、临时照料的简易机制，并依托负责人的社区威望有效调解家庭与邻里矛盾，形成了一套基于信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这些活动共同塑造了协会“老有所依”与“老有所安”的双重功能定位：一方面通过持续的情感互动和信仰活动强化了老人的社区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实质性的互助行动构建了生活安全网。

在与村两委的关系方面，H村老年协会可概括为嵌入与辅助。协会深度嵌入村庄的传统权力结构中，会长作为学校退休人员，其个人影响力与村委会权威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农村老年协会作为“银色力量”何以可能，正在于其能够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并发挥独特作用[7]。村两委视协会为了解民意、化解基层矛盾、稳定老年群体的重要渠道。协会更多是扮演协助者和民意反馈者的角色，独立性相对较弱，但与村庄情感联结更为紧密。在这个高风险的传统渔业社区中，老年协会实质上承担着社会稳压器的关键角色，它以柔性的方式维系着共同体的人际纽带，守护着社区的内在凝聚力，展现出传统村落自组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与韧性。

4. 运行成效与现实困境

(一) 运行成效

H村老年协会在多年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老年人个体层面，协会的建立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丰富多彩的活动与频繁的社会交往有效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促进了身心健康。农村老年群体的自我实现与组织逻辑，核心在于资源的激活与吸纳[8]。更为重要的是，协会帮助老年人在互助网络与社区调解中巩固了其经验价值，实现了从社会负担向社会资产的积极转变。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现实背景下，协会成功构建了新型的“在地化”养老支持网络，成为老年人重要的非正式养老保障。在社区与社会层面，老年协会成为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补充，凭借矛盾调解与情感治理维护社区和谐。有研究指出，老年协会在村庄公共性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有效整合村庄资源，促进社区认同[9]。同时，协会还承担着活化地方文化的重要职能，守护着渔业社区的集体记忆与妈祖信仰，有效防止了乡村文化空心化。特别是在传统渔业共同体面临转型压力的当下，协会通过维系老年人这一核心群体，有力守护了社区的内在凝聚力。从政策实施维度看，这一老年组织已成为国家积极老龄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地的重要毛细血管和有效抓手，将宏观政策转化为老年人可观可感的具体服务。

(二) 现实困境

H村老年协会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在可持续性困境方面，资金渴求与造血不足的矛盾突出。根据田野调查期间收集的协会财务台账及负责人访谈，2025年协会截至10月总收入3.8万元，其中村集体拨款1.5万元左右(占39%)，乡贤捐赠2万元左右(占53%)，自我创收仅0.3~0.4万元(占8%)，自我造血能力低。农村老年协会普遍面临经费短缺、专业人才匮乏等挑战[10]。在代际更替困境方面，骨干老化问题严重且接班人匮乏。协会会长接受访谈表示，核心负责人与理事会成员平均年龄达70岁，会长已72岁，精力有限难以应对复杂事务。而乡村精英的持续外流使得合格的接班人难以寻觅，协会曾尝试动员2名55岁左右的退休人员加入理事会，但均因“无报酬、事务繁琐”拒绝。老年协会的负责人年龄老化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组织的活力和持续发展[11]。在参与广度困境方面，服务覆盖存在“俱乐部化”倾向[12]。协会685名会员中，经常参与活动的仅120人(占18%)，且集中于60~70岁低龄健康老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参与率仅4%，失能老人几乎零参与。例如，村内82岁独居失能老人林某，因行动不便从未参与协会活动，日常关怀主要来自协会的不定期上门探访；问卷调查显示，65%的高龄老人表示“希望获得上门服务”，但协会因缺乏专项经费与志愿者队伍，无法满足该需求。在模式适应性困境方面，传统互助模式难以匹配现代养老需求。作为“共同体维系型”组织，H村老年协会

的互助多依赖人情伦理,缺乏专业化、制度化支撑。矛盾调解方面,处理一起亲子赡养纠纷时,因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支撑,调解耗时两个月才达成协议。据受访者反映,类似纠纷若由专业社工或专业人员介入,解决周期应该会短得多。传统人情互助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专业化的养老需求[13]。

5.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介入路径

H村老年协会的案例表明,仅凭内部力量难以突破当前困境,亟需引入外部专业力量进行系统性赋能。农村老年协会的韧性生存往往依赖于多重逻辑下的行动策略[13],而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为其提供新的发展动能。以下从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出发,提出五条介入路径。

(一) 资产建设视角:探索老年协会“造血”机制

资产建设理论强调通过资产积累提升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H村拥有独特的惠安女文化、渔业技艺等本土资产,且老年人普遍掌握相关技能,具备转化为发展资源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可协助协会开展针对性资产转化:第一,开发文化体验微项目。组织10~15名熟悉惠安女文化的低龄老人,成立“惠安女文化讲解队”,结合乡村旅游路线,提供惠安女服饰展示、渔歌传唱、民俗讲解等体验服务,按每人每次50元的标准收取服务费(参考周边旅游讲解市场价格),预计每月可接待游客3~5批次,创收1000~1500元。第二,打造手工技艺工坊。依托老年人熟练的渔网编织、惠安女服饰刺绣技能,成立手工坊,设计简易实用的渔网工艺品、刺绣挂件等产品,通过村旅游服务中心代销+线上朋友圈推广的方式销售。2025年惠安乡镇全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年接待游客量保持高位运行,年销售额可达2~3万元左右,扣除成本后协会可获利1~2万元。第三,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将协会闲置的20平方米储物间改造为“渔家记忆展厅”,陈列老渔网、老渔具、惠安女传统服饰等物品,收取少量门票(每人5~10元),同时提供手工品售卖服务,形成“展示+销售”的小型业态。

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是资源评估者、能力培育者和市场链接者,协助协会评估资源价值、培育经营管理能力、对接外部市场渠道,而非包办代替。这种资产建设路径与“连带福利”的再生产机制具有内在一致性[14]。

(二) 增能理论视角: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增能理论强调通过能力建设使服务对象掌握控制自身发展的能力。H村老年协会组织管理的核心矛盾是“传统信任机制”与“规范化需求”的平衡,社会工作者应采用柔性方式介入:第一,制定“简易版”管理制度。避免引入复杂的现代社团管理规范,协助协会梳理《会员公约》《经费使用须知》等3~5项核心制度,以“大白话”形式呈现,例如将财务公开简化为“每月10日在活动室张贴收支清单”,既保证透明度,又符合老年人认知习惯。第二,建立“老带青”骨干培育机制。筛选2名60岁左右、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协会骨干,与1名返乡青年(通过村两委动员)结成帮扶对子,由骨干传授协会运作经验,青年协助开展活动策划、线上宣传等工作,逐步培养后备力量。同时,为骨干提供每月200元的交通补贴(从政府购买服务经费中列支),提升参与积极性。第三,开展场景化技能培训。针对协会需求开展“活动策划”“简单财务记账”“应急救助”等专题培训,采用“案例讲解+实操演练”模式,例如模拟重阳节活动策划流程、现场教学记账方法,避免理论化授课。

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扮演赋能者和教育者的角色,通过能力建设让协会逐步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三) 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拓展外部资源链接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网络获取资源支持。社会工作者可协助协会构建“村内+村外”的多元化支持网络:第一,建立乡贤精准捐赠机制。协助协会梳理在外乡贤名录,按行业分类(经商、公职、技术人员)建立联系档案,针对协会具体项目(如文化体验项目、适老化改造)进行定向求助,将节日

慰问式捐赠转变为项目化资助。例如,对接从事旅游行业的乡贤,争取其为文化体验项目提供客源支持;对接建筑行业乡贤,争取适老化改造物资捐赠。第二,对接政府专项资源。协助协会申报惠安县专项项目,重点申请“老年互助服务”“文化遗产”类项目,获得的资金支持用于购置服务设备、支付志愿者补贴。第三,链接专业服务资源。与惠安县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镇卫生院建立长期合作,由社工每月1次到协会开展老年心理疏导、权益保障咨询服务,由卫生院每季度开展1次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讲座,所需费用从政府购买服务经费中列支。

这种资源链接能力的构建,正是老年协会从“被动输血”走向“主动造血”的关键一步。

(四) 优势视角: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优势视角强调关注服务对象自身的资源与能力,而非聚焦于问题和缺陷。H村的惠安女文化与渔业传统是协会最核心的优势,社会工作者可协助深度挖掘:其一,培育特色文化队伍。组织有文艺特长的老年人成立“渔歌合唱队”“惠女腰鼓队”,编排《出海谣》等贴合本土生活的节目,参与镇、县两级文艺汇演,争取获奖资金与演出机会,提升协会知名度与成员价值感。其二,举办小型民俗节庆。协助协会每年举办1次“渔家老年文化节”,设置渔歌比赛、手工技艺展示、亲子互动(祖孙共同制作简易渔网)等环节,吸引村民与游客参与,收取少量报名费(每人10~20元),同时邀请乡贤赞助,实现文化传播与经费创收的双赢。其三,建立文化传承档案。组织老年人口述渔业生产历史、惠女民俗故事,由社工协助整理成文字与音频资料,形成相关手册,既传承本土文化,又可作为文化体验项目的配套资料销售。

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扮演资源发掘者和能力培育者的角色,帮助协会看到自身优势并转化为发展动力。

(五) 社区工作方法:激活老年协会参与基层治理

社区工作强调组织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H村老年协会作为村庄内生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研究发现,老年协会参与基层维稳具有独特的逻辑与价值^[15]。作为内生型社会治理力量,老年协会依托精英老人的多元权威与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在矛盾纠纷调解、社会秩序维护、社区福利供给等方面发挥着“柔性治理”功能^[16]。从治理逻辑看,老年协会以较低的组织成本激活了村庄社会资本,通过“以老治老”“以老促和”的方式降低了基层治理的行政成本^[17]。社会工作者可运用社区工作方法,激活协会的治理参与功能:其一,组建“老年议事会”。选取5~7名威望高、明事理的协会骨干,成立议事会,每季度召开1次会议,收集老年人对村庄公共设施(如道路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的意见,形成建议清单提交村两委。其二,建立“结对互助”机制。组织20名低龄健康老人与30名高龄、独居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制定“每周1次探访、每月1次代购、紧急情况随叫随到”的互助约定,协会为参与互助的老人建立“爱心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免费参与文化体验项目,激发参与积极性。其三,参与村庄矛盾调解。选拔3~5名有经验的老年人组成“调解小分队”,在村两委指导下参与邻里纠纷、家庭赡养等轻度矛盾调解,凭借“熟人威望+情理结合”的优势化解基层矛盾。

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扮演组织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帮助老年协会从单纯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村庄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6. 构建支持农村老年协会发展的良性生态

为保障社会工作介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亟需构建一个多方联动、分层分类的支持体系。从政府层面看,应从管理者转向赋能者,着力构建制度化的支持体系。建议设立县、镇两级农村老年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建立稳定的基本运营补贴机制;将老年协会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通过项目化购买激励其提升服务质量;对开展经营创收的协会,提供税费减免、营销指导等政策支持;由民政、老龄部门牵头开展分层培训,并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老年协会提供专业督导和技术支持。从村级组织层面看,

应实现从资源提供者到战略合作伙伴的角色升级。村两委应通过联席会议等机制与老年协会建立常态化沟通,明确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权责边界,赋予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主动物色和动员相对年轻的优秀青年、退伍军人或返乡人士参与老年协会工作,并将其纳入村级后备干部培养体系;支持协会探索渔业文化体验等特色项目,为其发展提供实质性机会。从老年协会自身层面看,需推动从传统社团向现代社会组织的转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财务公开制度,以透明运作赢得信任;探索梯度化服务模式,逐步将服务延伸至高龄、失能老人群体;注重品牌化与特色化发展,在深化惠女文化内涵上下功夫,同时尝试从情感维系向“情感+专业”转型,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合作提升服务水准。从社会层面看,要推动从零星参与到生态化共建的转变。引导乡贤、企业从节日慰问式捐赠转向支持具体服务项目的精准捐赠;促进高校社工系、志愿者组织与农村老年协会建立长期结对关系;媒体积极宣传基层老年组织的积极作用和老年先锋事迹,改变社会对农村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为其发挥作用营造更宽容、更尊重的社会环境。通过政府、村级组织、老年协会自身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发力,辅以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方能构建起支撑H村老年协会乃至广大农村老年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7. 结语

H村老年协会的案例,是中国亿万农村老年组织的一个缩影。它既展现了乡土社会应对老龄化的内生智慧,依托宗亲网络、乡贤能人、地缘纽带,构筑起家庭之外的重要养老支持体系;也暴露了基层老年组织发展的普遍困境,资金匮乏、骨干老化、造血不足、服务单一,仅凭内部力量难以突破发展瓶颈。引入社会工作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要替代老年协会的主体性,而是通过专业方法激活其内生动力,帮助这些“银发守望者”从被动维持走向主动发展,从“活着”走向“活好”。

然而,一个老年协会的可持续发展,终究不能仅靠外部力量的“输血”,更不能依赖个别能人的“人治”。它需要政府从管理者转向赋能者,需要村级组织从资源提供者转向战略合作伙伴,需要社会力量从零星参与转向生态化共建,更需要老年协会自身从传统社团转向现代社会组织。农村老年协会的“活起来”,不仅是资金的活、活动的活,更是组织的活、功能的活、尊严的活。当这些扎根乡土的老年人能够在组织中找到归属、在服务中体现价值、在参与中获得尊重,积极老龄化便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发生在田间地头、厝边头尾的生动实践。让每一个基层老年组织都能发光发热,让每一位农村老人都能体面、尊严、有价值地安度晚年。这既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工作的初心所向,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回应的人文命题。

参考文献

- [1] 刘成坤.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12): 31-45.
- [2] 甘颖. 农村养老与养老自组织发展[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2): 48-58.
- [3] 李永萍. 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基于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2): 110-122.
- [4] 柴书毓. 乡村社会力量何以可为——基于晋南地区老年协会礼俗实践的考察[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38-145, 192.
- [5] 王进文. “通过老协”: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自组织路径及其实践机制——以鄂中G村老年人协会为例[J]. 社会保障研究, 2025(3): 55-66.
- [6] 王振, 刘林. “礼俗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老年协会的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4): 98-106.
- [7] 邓燕华, 阮横俯. 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8(6): 131-154, 245.
- [8] 石伟. 资源的激活与吸纳: 农村老年群体的自我实现与组织逻辑——以老年协会为例[J]. 宁夏社会科学,

- 2024(6): 147-158.
- [9] 胡宜, 魏芬. 复兴孝道: 老年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障——以洪湖渔村老年协会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8(4): 71-79.
- [10] 余虹, 鲁可荣, 郭海霞. 浙江省农村老年协会能力建设现状及促进政策[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2, 32(23): 5239-5240.
- [11] 余家骏. 试论农村社区自治的新兴力量: 老年人协会[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5, 9(2): 15-19.
- [12] 刘妮娜, 房罗鑫. 殊途同归: 农村老年协会互助养老的发展脉络与优化导向[J]. 社会建设, 2023, 10(2): 26-36.
- [13] 王辉. 韧性生存: 多重逻辑下农村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基于农村老年协会个案[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9): 53-63.
- [14] 王辉, 金华宝. 连带福利: 农村老年协会福利再生产——基于浙江义乌 H 村的个案分析[J]. 探索, 2020(6): 156-168.
- [15] 黄思.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农村老年组织: 治理资源与参与机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8(6): 74-79.
- [16] 董海宁. 现代农村社区福利的产生和促进——对浙江宁波 L 村老年协会个案的考察[J]. 社会, 2003(11): 9-12.
- [17] 黄乾, 原新.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层老年群众组织作用研究——以老年人协会为例[J]. 人口学刊, 2006(3): 24-28.